

一五四七年

观察

第三卷

第十三—十六

廿三—廿四



觀察

13224/88

(第17,22期)

·元百五千一售·

日四十二月五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第三十期



第二卷

專論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巴黎通信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

討論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土太大」

及其利弊

生活與文化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費孝通

選·打·吃——張羣內閣登台後

的三件事(南京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

通信

中大競選旁觀記

從美軍下旗到張今吾被釋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獄中生活簡記(一)

週末闌欄

談謠言

張東蓀

讀者

投書

請參政員領導全國和平運動
白崇禧之言 官場一套 學生駭不退
兩黨之最低希望 前賤未清 去蔽 對民青
擬「頑固派」出洋考察的路線 免開尊口

觀察

漫畫

撰稿人

撰稿人

蕭戴戴錢錢劉潘葉楊楊傅馮郭宜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沙李吳吳呂伍卞	公鍾文鍾歌能大光公公剛斯希有移東沉實炎瘦友德克無白學浩澤世昌復元中琳	權齡賽書川欣杰且璧超權剛年孟至守今籍長秋德竹松珩敦寬忌適華浚培霖昌復元中琳	顧蕭戴鮑錢錢樓蔡趙雷楊楊費曾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李李吳沈任王	翊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孝昭友斬正德忠印維衡之君寅先義子廣純恩有鴻翥芸	羣乾光民升廉彥藩構宗孟絳通掄以銘欽堂禹稷哲遇遜初盈驢林亞田青裕裕乾雋最生
-----------------------------------	------------------------------------	---------------------------------------	--------------------------------------	-----------------------------------	--------------------------------------

讀者投書

請參政員領導全國

和平運動

編者先生：轉參政員先生：內戰給予我們的痛苦威脅，實在嚴重。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有責任而且也是義務來制止它。參政會開在即，我們懇求有魄力有勇氣的參政員先生倡導於先，全體人民響應於後，來一個敦授、學生、工人、商人、農民、以及公務員一體參加的全國性的和平運動，並且希望北大、清華、燕京、中大、金大、復旦、交大、暨大、浙大、武大，以及所有在各地負起領導責任的學府，成為這個和平運動的中心，形成一股洪流，結成一條鋼鞭，迫使好戰的人放下武器，重走政協路線。這不是造反，也不是革命，而是愛國、愛家、愛人、愛己、愛和平、為民族請命的表現。我想有良心的，人，一定都是有同感的。一個人雖然脆弱，但是全體的力量却是無比的，希望大家實毋勞費，竭誠力援。

一位愛國的青年 洪潮
五月十六日 南京

學生駭不退

編者先生：十三日交大學生赴京請願，北站的一幕，各報均有記載。交大校長在北站大幅佈告：「如截至十三日下午九時止尚未離開車站或十四日不上課者，均予開除學籍。」那天深夜宋部長被迫硬着頭皮到「請願專車」去「訓話」時，也說：「你們已不是交大學生了！」結果終由宋部長簽字接受了學生要求，請願的學生才於十四日上午離開車站回校。還是吳市長痛快直爽：「祇要回校，就是一個也不開除。」現在的學生已不是拿「開除」的處分可以駭退得了的了。要是說話做不到，以後還是少說的好。

一學生 五月十六日 上海

白崇禧之言

編者先生：五月二日大公報載白崇禧先生說：「共產黨絕對不是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而已」，對極。有些黨派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

吳求是 五月八日 香港

官場一套

編者先生：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長曹芻稱：「本年中學會考，正在準備之際，適值物價劇變，籌備事宜諸受影響，一部份省市教育廳局紛紛陳述意見，請求展緩舉行。本部查核所陳尚屬實情，姑准展緩一年，已飭各校仍照嚴格舉行畢業考試。」今年的中學會考終于

停止舉行了，而停止的理由是物價劇變。這個理由大概也是被了許多腦汁才想出來的。最妙是查核所陳「尚屬實情，不說停止，而說「姑准」展緩，官場自有官場的一套。

傅傳經 五月十七日 上海

去蔽

編者先生：讀潘光旦先生「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文，深深悟到去「蔽」的重要。我們國家弄到這個樣子，完全是「蔽」在那裏作祟。願讀傅雷先生「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一文，不啻予患「蔽狂病」者一帖清涼散，這種宣傳藥劑，大有利於病人，請嗣後多多介紹！

蔡澤安 五月十三日 杭州

對民青兩黨的最低

希望

編者先生：自國大開過，民青兩黨決定參加改組的政府後，梁漱溟曾函詢兩黨參政目的，獲有冠冕堂皇的含混答覆；繼而張東蓀黨民社黨以具體而微的問題：對全面停戰及保障人權有何把握？若無把握是否即退出政府？這便使人家不好回答了。梁張學者氣味都太重，期所有政黨都有主張有立場，未免太奢望了。民青兩黨若對和平固執不放，重視第三方面的任務甚于一己的「權利」，則早就不會與第三方面脫離。兩黨既走定了另外一條路，梁張二位貴之已晚，再期以和平民主的重任，不是對他們估價過高之癡，就難免放意為難之嫌了。

卑之無甚高論，我對兩黨有個一

最低希望，就是但願他們不染貪墨之習而能倡導一點廉潔之風。民青諸公，你們既已參加了國府，今後便須與之同命運了。國府昌，你們也隨之昌；國府亡，你們也與之亡；而新喪國府生命，甚而可致其死亡者，厥為貪墨。你們若不染有此習，則不啻加強摧殘國府的力量，縮短自己的政治生命，望莫再重今輕來，因小失大。反之，諸公若能以今日之行，符昨日之言，廉潔自持，有所不為；則未始不可轉移一點政風，使人民改變一點對國府的觀感，生起一點信心；這于國府及諸公都是有利的。

錢熙光 五月十日 北平

前賬未清

免開尊口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募銷美金公債，成績惡劣。在浙江區的人，以前認購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多數選執着前浙江地方銀行的不兌現臨時收據，迭向該行詢問，總以未奉財部撥發為辭，延不解決。我想政府要維持信信，應迅速處理，否則人民要掛起一塊「前帳未清免開尊口」的免職牌了。

周叔謙 五月十五日 長興

擬「頑固派」出洋

考察路線

編者先生：國民黨中的「頑固派」是中國「政治民主化」大道上的阻礙，這是馬歇爾將軍在華經一年多觀察後所指出的，全國（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編主平安儲
察 觀
期三十第 卷二第
日四廿月五年六十三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錢能欣：
沙學浚：中央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袁昌英：武漢大學教授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儲安平

大局浮動到了極點。到處不安，到處憂懼。舊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個局面趨向瓦解，總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所致。一個局面的瓦解，非一日之事。在開端時，昏庸之統治人物恆不以為意；但當它挾狂風以驟至的時候，台上的人物遂驚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來泛濫全國的米潮和學潮，無不表現當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終日。我們早就認為這次政府的改組，無甚意義。現在改組已逾一月，改組後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無任何作為。張羣內閣一上台，物價就搶先興奮。米價在半月內漲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無錫、蕪湖、宣城、合肥、吳興、衢縣、以及遠至四川的成都，無不有搶米的風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子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掙扎其生命，這說明民間疾苦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搶米行為不限一地，竟然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這說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亂到什麼程度！到處騷動，到處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無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來革命。

這次各地學潮，原因不一。教育經費問題，教授待遇問題，學生副食費問題，男女分校問題，會考問題，人權問題，校長問題，遷校問題，護校問題……一連串的一問題。本來是一些個別的局部的問題，經過多日蔓延演變的結果，據今天（十九日）報紙記載，似又進了一步變成一個更擴大更嚴重的問題，在南方變成一個「搶救教育危機」的問題，在北方變成一個「反內戰」的問題。這次學潮開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後接上幾個大學的學生為爭取他們本身各別的目的，請願遊行，而現在則在一種更大更普遍的呼籲與要求下，形成一種狂風暴雨式的全國罷課局面。從中國的南部到北部，東部到西部，幾乎整個的國家都受到這種學潮的激盪，沉淪在一種無底的動亂與憂懼之中。我們無意在此就每一學潮一一論評，我們認為從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觀察這如火如荼的學潮，其意義遠為重要。我們首先要問，這種涵湧澎湃的學潮，其包含的政治意義為何如？我們認為在這些學潮的底層，都潛伏着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即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於現狀的普遍的不滿。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於當前局面實在懷有一種澈頭澈尾的高度反感。我們先就教育本身來說，為什麼多年以來，軍費黨費團費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質的費用，動輒鉅億，而獨對於教育經費如此吝嗇？為什麼那些達官貴人，汽車洋房，享受優裕，而一般公教人員却不能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為什麼教育不當教育辦，要任命那種有黨辦黨有官做官的人來做大學校長？為什麼不能讓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發展，而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加以限制？為什麼不能在根本上改革中國的「育制度，整理課程，充實設備，增加經費，培養學風，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識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週，三餐不飽，身體疲乏，精神萎靡，而一想到來日，則尤中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畢業的階段，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自己空虛，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前途茫茫。這些還是在學校圍籬以內分析。要是再將視線放遠，看到國家一般情形，更是絕望苦痛，欲哭無淚。八年抗戰，幸未覆亡，國家總算乘此得到一個翻身的機會，為什麼不好好努力，埋頭建設？沒有一個國人不在呼籲和平，沒有一個國家同情中國這種內戰，為什麼內戰不能停止？物價這樣漲，漲到駭死人，為什麼一天一天的過去，政府當局總是沒有一點辦法？為什麼有些人的財產越來越大，而一般人則越來越沒有飯吃？為什麼政府對於那些大多數的窮苦百姓，總沒有一個

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為什麼在今日這種社會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搖過市，優遊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品的人物，反而在水準之下的生活中掙扎？這是不是社會的不公平？為什麼政府容許這種不公平的存在？為什麼漢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為什麼祇要有槍桿子的人，翻來翻去總是一「忠實同志」？為什麼種種貪污不法的事情，報紙抨擊，衆口指摘，而政府對於這些案子總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懲辦一下？為什麼有些人祇要顧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車，做到大官，佔到地盤？整個局面，混混沌沌，良心喪盡，道德蕩然，綱紀廢弛，人心麻痺，人人祇知混水摸魚，取巧爲私，國運日微，民生日蹙，凡此種種，對於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請問何能使之甘心！請問何能使之甘心！……無論從國家大事，或者到個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緒是苦悶，徬徨，失望，憤怒。他們看不到一點光明，看不到一點希望。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在內心中漸漸鬱成一團怒火。這一肚子氣，這一肚子火，碰上機會，自然得發洩出來。這是多年以來他們耳聞目擊身受種種反感所累積而成的一種反應。反感越多，累積越久，在發洩的時候，其情緒也就越激烈，其態度也就越倔強，其意志也就越剛毅，而其涵湧澎湃，奔沖激盪的力量，也就越兇猛而難于遏止。

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赴京請願，在當時看，實已構成極度緊張劇烈的場面。但事態發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這個還在發展中的學潮中，顯然業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僅僅成爲這次整個學潮中的一個序幕。但我們即使就以旬日以前當局對於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請願，激發奔走，如臨大敵，甚且不惜拆斷鐵路，阻止請願學生的前進爲例，亦可想見這種「惡性學潮」是如何的使南京當局心驚肉跳。各校學生請願，都有他們各別的請願目的，這些目的，若就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說，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當局對於當時英大交的請願，所以心驚肉跳，乃是因爲這些學潮，在表面上，雖然祇限於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從一種更廣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它還包含着更重大的政治意義。英大學生在杭州車站所表現的力量，並非純粹來自那幾百個英大學生；同樣，交大學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現的力量，亦非純粹來自那一千二百個交大學生。幾百個甚至幾千個，那是看得見數得清的。看不見數不清的是在那些學生的後面，還有着一個更大更不安的社會。爲學潮所連帶反映的那種社會的不安，才是使當局所以爲之震頭恐懼，日夜不安的原因。他們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學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風暴。果然如他們所恐懼的，這幾天的學潮比英大交大請願時，範圍更擴大，性質更嚴重，來勢更兇猛。照這兩天（十八、十九

）報紙消息，學潮顯然已從局部的變成爲全面的，從分散的變成爲團結的，從不公開提到政治問題而趨向公開提到政治問題。歷史上的事實，有時恆非當時所能預料者，共產黨的拆毀鐵路竟亦大有助於國民政府，目下以京滬杭爲中心的學生運動，業已攜手，若非津浦鐵路不通，恐怕南北兩地的學生亦已攜手同行。這次這個全國性的學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現在北方正在接踵而來。照蔣主席的談話以及國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政府對於學潮似將採取嚴峻處置。我們除了感覺當前的學潮似乎正在發展擴大之中，尚未達到最高階段之外，尙難預料這個學潮將在什麼時候以及何種情形之下始能結束。祇是我們願意向政府進一言者：凡是一個社會現象，必有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補救解決，一切處置徒然使事態更趨惡化。要知今日中國的學生已非嚴厲斥訓或強力彈壓所能駭退了。政府必須在學潮中獲取教訓。政府必須明白，無論學生本身承認或不承認這點，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乃爲對政府過去及現在的作風表示不滿。他們顯然在示威，在抗議。用着憤怒的呼聲，憤怒的眼光，並以一種挨餓吃苦的精神，來訴斥並鞭策台上的人們。他們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國家像樣，而進入於康樂富強之境。在台上的人們要知今日中國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你們，仇視你們。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絕大多數人在心底裏都以白眼報答你們。祇是你們有權有勢，有槍桿，有鈔票，一般老百姓雖然受你們壓迫，受你們欺騙，受你們侮辱，受你們剝削，但在你們的淫威之下，無可奈何你們。在這種局面下，學生挺身而出，對國是表示一種抗議，實亦爲他們在這個時代中所應肩負的責任。他們所以能肩負這個責任，一方面因爲青年都懷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種不平則鳴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們幸而能有一種組織，在集體中表現其意志，以俾免頭顱與身體脫離的危險。每當我們目擊青年學生遊行示威時，無不衷心激動，熱淚盈眶。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之疲乏與饑餓，還着一股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內，亦何幸而有這一批熱血青年，能責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南京學生饑餓請願的主席團說：「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十六日文匯報）這是多麼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在多年多種的鍛煉下，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中年或老年

人所能想像。他們有感情並有理智，並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於他們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種種現象誠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觀，然而頗有這批青年，才使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一點國家新生的希望。我們承認輿論的起伏足以增加社會的不安，但要使社會得到安定，先須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決不是大官的訓話或一紙命令所能奏效，這要執政當局拿出良心和辦法來

，一一見之實行。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者，實莫過於執政當局之能够犧牲他們已得的一部分權利，唯有這樣，人心才能平，社會才得安定！今日這批青年都是來日建國的棟樑，如何使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極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當局如何的領導這批青年。

五月十九日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樓邦彥

法律與政治的界限

我曾在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指出所謂官吏的民權問題，就其內容言可以分爲三方面：（一）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二）公務員的結社問題，（三）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該文乃以新「憲法」第二十八條爲出發點，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作較廣泛的原則上的討論，今因鑒於滬電信局及國際電台員工，最近爲要求調整待遇未能如願獲得答覆，而實行怠工一事，讓我們繼續來討論關於官吏民權的又一方面——即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公務員的罷工不能罷工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個雙重的問題暫難作一肯定的解答，那就是因爲我們無從在這一方面劃定法律與政治的界限之所致。

把公務員的罷工行爲看作一個理論上的問題時，我們認爲以公務員的身分及其所佔的地位之特殊，罷工行爲是理應被禁止的。這可以分兩點來說：

第一，由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區別，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並非私法上的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因爲公務員的法律地位乃由於國家的公務上行爲的結果，而不是基於國家與公務員所訂定的任何性質的契約。公務員的地位與普通勞工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爲公法所規範，後者爲私法所規範，公法上的權利義務與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在本質上原是有區別的。依據國家法令，公務員享有特殊的專屬於公務員的權利，負擔特殊的專屬於公務員的義務，既是如此，公務員當然不能要求具有相同於普通勞工的地位。基於私法上的僱傭契約的普通勞工，在原則上固然可以享有罷工的權利，公務員的法律地位既然是相當特殊，國家以法令禁止公

務員的罷工行爲，在原則上自然是可以自圓其說的。這是我們從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第二，中立的公務員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在「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曾經說過：「政府若以民意爲依歸，政府權力自然常會更換，而我們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也愈大，我們要求他們在受不同主人的指揮之下，在不同的時候忠實地執行傾向或性質完全不同的政策，做到人民與政府兩方都信任他們中立的地步，那麼民主政治雖則有流弊，其流弊也就難以發生。」我們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若作如此結論，法律自應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爲，因爲公務員若能罷工，便會常常產生公務員要挾政府的舉動，而要挾又難免含有政治性的成分，公務員的中立地位就受到影響了，間接地也使得民主政治遭遇阻礙。公務員與普通勞工的身分不同，民主政治要求公務員必須中立，必須不參加任何性質的積極政治活動，於是普通勞工所享有的罷工的權利，便成爲公務員爲維護民主政治的基礎而犧牲的一種公民權利了。這是我們從公務員的中立地位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以上是僅就理論而言，若就具體的法制來說，以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爲例，沒有一個國家曾以憲法或法令直接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爲，或明白賦與公務員以罷工的權利。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以後，法國國會一再討論關於禁止公務員罷工的法律案，但始終沒有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國曾發生過幾次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有時竟致造成國家很嚴重的危機，例如一九一〇年國營鐵路員工爲要求調整待遇而聯合罷工，當時的白里安政府被迫以非常手段加以斷然處置，依法把所有參加罷工的員

工徵召入伍，置於軍事機關的管轄與指揮之下，罷工風潮始告平息。此後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亦時有發生，而尤以第四共和國成立後，發生於今年二月十四日的五百萬公務員聯合舉行四小時示威罷工一事為最嚴重，他們的目的是為要求調整待遇與平抑物價，結果致使全面的騷動不安，交通、警務以及其他重要公務均告停頓，拉瑪迪總理向國會演說，有一如法國不能維持國家紀律，國家與共和政體均將陷於危境——之語，可見事態在當時的緊張程度。美國的公務員罷工事件也是屢見不鮮，一九一九年波士頓警察的聯合罷工，到最後也還是集合民團後，工潮才平息下來。英國的公務員或許可以說從來沒有罷過工，當一九二六年全國總同盟罷工發生時，由於不少的公務員職工會是加入總工會的，當時的態勢便變成非常微妙，即公務員對於全國總同盟罷工應採取何種態度；據說總工會當時並未主動地要求公務員參加，同時公務員職工會也幾乎一致感覺本身地位的特殊與重要，而不認為他們有發動同情罷工的義務。在英美法的任何一國，雖然公務員的罷工行為在原則上並不違法，但是他們一方面可能在某種情形下，由於某種行為，而觸犯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以違反服務紀律為理由的懲戒處分（其最重者可以是撤職）。

我們雖然認為在理論上公務員是不應該罷工的，但是幾個主要民主國家的具體法制却都沒有特別禁止公務員罷工（事實上參加罷工的公務員或許不免會受到相當的犧牲），而實際上我們也覺得公務員的罷工是一件絕對禁止不了的事情，這便牽涉到問題的政治一方面了。

國家最低限度要做到的一件事是維持社會秩序，可是不着邊際的主權觀念不可能作為政府權力的根據，單純的武力也絕不能換取人民的服從，我們認為社會秩序的得能維持，全有賴於一般人對於客觀公法關係的認許（acquiescence）。政府是以它的功能為其存在理由的，由於這一個政治上的基本道理，人民的服從政府並不是無條件的，國家制定的法律也是有限

度的。以推翻政治現狀為目的的革命，無論如何是一種違法的行為，但當人民要覺得非以革命為手段來推翻政治現狀不可的時候，不但法律的黑白禁條發生不了絲毫作用，就是政府的任何力量也是止擋不住的，這是證明法律的盡頭和服從的界限。革命是如此，公務員的罷工亦未嘗不是如此。關於公務員的罷工問題，我們所要問的不是「公務員罷工能否享有罷工的權利」，而是「公務員如何可以沒有罷工的企圖」；前者僅為一個原則，容易解答，後者才是比較實際，性質甚為複雜。國家不能以單純的威權去禁止公務員罷工，正好像它不能以威權去換取一般人民的服從一樣，祇有當公務員認許客觀的公法關係時，或者具體地說，祇有當公務員感覺政府對於他們的確在維持公平正義時，他們才不致以罷工為手段來達到他們的要求。罷工顯然是公務員在不推翻政治現狀的條件對付政府的一個最後手段，他們是被迫而出此的，這是每一個決定立法政策者所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有人曾研究一千一百六十六次的美國公務員罷工事件，獲得一個結論，認為公務員的罷工問題絕不是靠國家以法律明文禁止便能完全解決的，這與我們上面所提出的看法正相符合。

我們的結論是：根據國家與公務員的法律關係，以及為維護民主政治而公務員必須保持中立地位兩點，公務員在理論上自不能享有罷工的權利；但是法律儘管禁止，問題本身並未獲得解決。解決問題的努力，應從政府及公務員兩方面着手：政府方面，應繼續維持一種可為公務員（或大而至一般人民）所認許的客觀的公法關係；公務員方面，罷工應始終被視為一種萬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一切的要求絕不能超出與其切身有關的事項，他們千萬不可利用罷工來作政治性的要挾。

然而究竟甚麼地方是法律與政治的界限呢？我們願意努力去劃定這界限，但是所有的努力，恐怕多半會是徒然的。

卅六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巴黎通信）

錢能欣

一 前言

自從德國投降聯軍分佔以後，歐洲的和平已不復是盟國與敵國之間的問題，而成了盟國彼此間的爭執。

為了這爭執，在過去兩年中，貝爾納斯五渡大西洋到歐洲來和莫洛托夫談判，從倫敦五外長會議到巴黎二十一國會議，其間經過了不少的爭論，討價還價，甚至冷笑與熱罵，最後才商定了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完成了歐洲和平的第一步工作。

在上述的五個和約中，不但各別規定了五個戰敗國的義務，而且劃分了英美與蘇聯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英美在公開的會議上爭得了制止蘇聯在東南歐勢力的擴張，最明顯的是脫里斯特劃為自由區置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控制之下，以及希臘保有塞拉斯與馬敘頓，以制止保加利亞向地中海的擴張。

現在輪到了更棘手的德國問題。棘手的是英美法蘇四佔領國不祇在爭論如何處置德國巨大的土地，豐富的物資，新式的工業，而且更複雜的是要爭取大家認為優秀可用的日耳曼民族，大家都想把它收拾在自己手下；也許目的都是為着和平，但對於和平的建造却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張。

二 英美法蘇的對德政策

英美對德政策大致相同。英國主張德國政府應以調和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為原則，主張經濟統一，反對巨大的賠款，主張魯爾區成為德國聯邦的一部分，煤鐵礦產與德國中央政府，工業的管理也交還德人，而生產政策及如何分配，須受國際魯爾管理當局的控制，後者應由英美法及荷比等利益關係國組織，並邀蘇聯及其他東方盟國參加，但須以互惠為原則，這便是說如在德國東部設立相似的國際管理組織，亦應邀請西方盟國，並准許德國中央政府參加。國際魯爾管理當局於盟軍佔領結束後應成立國際魯爾軍隊加以保障。英國堅決反對法方分離魯爾的主張。關於德國政府，英方主張凡有關全國性的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等，應屬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應為兩院制，一由普選產生，一由邦代表組成，總統權限應加限制，在正式憲法完成之前，應有臨時憲法，但須經盟軍當局批准。

美國的對德政策，馬歇爾承認貝爾納斯的原則。這原則貝爾納斯去年九月間在史德加特的演說中闡述得很明晰：美國主張從早成立分權的德意志聯邦，為達到此目的應即設立德意志全國會議，準備臨時政府，起草憲法，交由人民復決，並設一經濟機構，增加生產，務使達到人民可以自給，不靠外來幫助，因此主張德國經濟統一，取消現存的區與區間的壁壘。關於賠款，主張依照賠償能力而定，反對蘇聯違背波茨坦協定的百萬萬美金的要求。至於德國疆界，主張：（一）薩爾區分離，經濟上可歸附法國；（二）東普魯士的古尼斯堡劃歸蘇聯。美國反對魯爾及萊茵分離德國。認為東方奧得河為界的暫時規定，並非最後界線，但同意波蘭可取得若干土地以補償其寇松線西部劃歸蘇聯的損失。

法國在四國之中雖然是最不受重視的一角，但她對於德國問題本身實

在比任何國家都關心。因為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失敗德皇在凡爾賽宣告成立德意志統一帝國以來，法國領土又兩度受到德軍的侵略。法國需要「安全」，這一點，全國人民無論左派右派，是一致的。為達到安全的目的，消極方面防止德國的復興，因此主張德國政府應為極度地方分權的聯邦，魯爾分離德國，使重工業不復為統一的中央政府操縱，薩爾在經濟上歸附法國；在積極方面，要求賠款，取得魯爾之煤鐵，以及德國之人工，以供給其自身的四年復興計劃之用。

法政府對於德國問題，有着具體的一貫的政策。莫斯科會議前，曾相繼分致英美蘇三國政府說帖共三件。第一件關於對德和約簽訂前或軍事佔領結束前的德國臨時政府組織問題；第二件關於盟軍行政管理結束後的德國憲政組織問題；第三件關於魯爾的國際經濟管理問題。在第一第二兩說帖中，法方主張把德國分成若干邦，各自為政，另設無實權的聯邦政府。至於有全國性的經濟、郵電、交通等，則另設若干獨立的中央組織專門管理。將來憲法中的議會，主張由各邦推選代表組織，不用民選方式；另設最高法院以牽制聯邦議會。外交權雖可屬於聯邦政府，但聯邦政府不得干涉各邦與外國互派使節及簽訂有關各邦利益之條約。

關於魯爾的說帖中，法方仍堅持魯爾區須分離德國本土，並擬定該區的範圍。據法方的統計，戰前該區（如將目前波蘭佔領地區及薩爾除外）所產之煤，佔德國全產量百分之九十，生鐵百分之七十二，鋼百分之七十四，熟鐵百分之六十九。法方以為如英美堅不贊同特設國際管理機構，則退一步主張：把魯爾區交由安全管理會管理，採取類如脫里斯特自由區的折衷辦法。

在另一方面是蘇聯的對德政策。蘇聯一直主張德國的政治形式應為中央集權，反對西方盟國所提出的聯邦制度。莫洛托夫說：「聯邦制度目的在瓦解德國，恐引起德國人民的報復心理，進而促成產生新的俾斯麥或新的希特勒。」他們以為設立健全的中央政府，可以使德國走上民主的正軌，盟國不但易於控制德國政府也不能逃避履行戰敗國的義務。

關於經濟上的統一，原則上蘇聯也表同意，但須先解決賠款問題。蘇聯要求百萬萬美金的賠款，而且堅持其中一部分須從日常生產品中取得。他們以為這數目雖大，但比起蘇聯在戰時的損失，尚不及十分之一，且稱英美法在各佔領區所取去的物資總數比百萬萬美金還多。

三 莫斯科初步會談

經過了英美法蘇四外長代理人三個月倫敦的準備工作，四外長於三月

十日集會於莫斯科。

四外長之中，莫洛托夫是蘇維埃革命外交家，共產主義的維護者，「民主獨裁」集團的代表。貝文是辦工會出身的社會主義改良家，西方民主的保護者，大英帝國的拯救人。他們是熟人，在國際會議中初次敘會於波茨坦會議的後期，那時英國工黨剛上台，貝文代替了艾登為外長，隨艾德禮去繼續三巨頭會議；此後和平談判，自一九四五年冬季的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中經倫敦五外長會議，巴黎四外長會議，巴黎二十一國和會，以迄於紐約聯合國大會，貝文和莫洛托夫都親率代表團，競相角逐，彼此可稱得知已知彼。

皮杜爾當年以地下工作的靈魂人民外交家的姿態，出任戴高樂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不久隨戴高樂飛往莫斯科簽訂法蘇同盟互助條約。兩年來法國政局雖多變故，但除了去年冬季里翁勃魯姆臨時內閣的三個月中外長一職由總理兼任外，皮杜爾幾乎未曾離開外交部。法國的戰後外交政策，除戴高樂時代受臨時政府主席的拘束外，幾乎整個出之於皮杜爾之手。莫斯科會議之前，法國發生閣潮，也因為由於皮爾杜的多方努力，使自己的進步天主教黨（即人民共和運動）終於參加聯合內閣，如此皮爾杜得能保持外長職位，繼續其一貫的政策。不過這次到莫斯科和他兩年前隨戴高樂去簽訂法蘇同盟條約的心情不同了：第一，這次他的對像不祇是蘇聯一國；第二，這次他帶着各黨各派同意的計劃，他祇須忠於計劃，忠於政策，不必受制於意志堅強的個人。

馬歇爾在外長會議中是新人，但在國際會議中他倒不是生客。當年追隨羅斯福總統參加卡薩勃朗卡、開羅、德黑蘭、雅爾達等會議，和莫洛托夫累次會晤，彼此早已相識。他當時一再反對邱吉爾進攻巴爾幹，堅決主張開闢西歐戰場，尤為莫斯科方面所贊揚。

但因時事的演變，過往的經驗往往不能適應目前環境。羅斯福總統當年努力奔走所促成的人類高尚的原則：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以及其他若干真誠合作的文件，今日却已成了廢紙。在戰時誰也沒有料想到今日的情況竟至於如此的不幸。莫斯科會議所遭遇的是一個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的難題。德國在四強佔領之下，各有各的計劃和政策。蘇聯鑒於英美既食言於光明堂皇的大西洋憲章，進而更在軍事上合作，造成對其包

圍的形勢；英美則鑒於蘇聯的盤踞東南歐和巴爾幹，拒絕西方國家插足，更想伸展到地中海及於近東和非洲，直接危及大英帝國的生命和英利堅的繁榮。德國對於蘇聯和英美都是歐洲最後的堡壘，彼此不肯輕於讓步，何況在莫洛托夫背後的尚有着數百萬效命疆場的紅軍，和千百萬會遭受德軍蹂躪的人民支持他監督他和英美週旋。

英美對於這次莫斯科會議是有着決心的。貝文會坦白地聲說：「我們這次並不是來像雅爾達會議那樣的讓步的……」非但如此，而且會各別表示了姿態：如兩年來若接若離的英法同盟談判，貝文和皮杜爾忽於赴莫斯科的前夕匆匆趕到七年前三十萬英軍光榮撤退的鄧扣克海岸簽訂了兩國五十年防德同盟條約；再則杜魯門總統於莫斯科會議開始不數日即發表舉世震驚的四萬萬金元協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宣言。

在雙方堅持的情形下，從經濟統一，賠款，政府組織，德波疆界以至於魯爾薩爾等問題，一再磋商，一再爭執，一再不得同意。

因為在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之下，所謂出類拔的人才也會失去正義感和同情心，祇有自私和猜疑。莫洛托夫既對賠款問題堅持雅爾達的決議為理由，要求德國應以日常生產品作為賠償的一部分，而不顧違背波茨坦的修正案，對德波疆界問題則堅持波茨坦的暫時辦法為永久的決定。而貝文何嘗不以駐軍近東和希臘、甚至協助法軍重佔越南、荷軍重佔東印度、為其帝國安全的理由？馬歇爾又何嘗不以協助希臘土耳其整頓軍備以及遣派大批海陸空軍事人員至友國顧問軍政大計，為世界安全的口實？會議外交時至今日，連「言之有理」的最低限度的技巧也不復需要了。法國某畫報在去年巴黎四外長會議時會繪小插圖諷諷皮杜爾，圖下註稱：「今日我才明白了二加二等於三」。其實，現時代中多少大事都應用着這個二加二等於三的歪曲的理論。

皮杜爾在這次會議中未能盡中間調停的責任，原因：第一，德國問題對法國本身的利害關係太深切，法國有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不能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解英美與蘇聯之間的衝突。第二，法國的主張和要求幾乎均未能獲得其他三國的同意。例如高度地方分權的主張遭蘇聯反對，魯爾國際管理的計劃不為英美接受，薩爾在經濟上歸併法國的要求尚在莫洛托夫的考慮之中，因為蘇聯希望德國西部地區一起解決，不願單談薩爾而捨棄更

重要的魯爾區和萊茵區。第三，法國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黨及激進黨合作的聯合內閣，實質上非常脆弱，正因為莫斯科會議，大家都在忍耐，務使皮杜爾能安心終會；在皮杜爾方面，鑒於聯合內閣的不安定，更小心從事，能忠於政府的訓令，爭得到資源，尤其是煤鐵，那末也算不辱使命了。

關於煤的要求，皮杜爾終於不得不下哀的美敦書，他不能空手回巴黎，他老實告訴他的三位同僚說：「敝國政府訓令本人表示，如德國煤的出口不能如我等要求獲得解決，法政府對於德國經濟統一、工業復興及賠款等計劃，一概難於贊同。」

英美為緩和法方的焦急，使其對於德國問題的談判，安心就範起見，同意於會外和法方訂立三國協定，規定英法三佔領區中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六個月的出口煤量的分配。在這分配中，法國每月可分得自十九萬三千噸增至三十七萬噸。如將薩爾的產量，也算在內，則至本年年底法國每月可得六十萬噸。

這協定在政治上所表示的是法國和英美接近一步，和蘇聯遠離一步。皮杜爾之所以走此一着，一則果然為遵行政府的訓令，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爭取煤炭，正如他回到巴黎在車站上似乎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還帶了一點煤來！」一則也是為了貫徹他的政策，因為他深知法蘭西帝國的前途，尤其是他的天主教黨的出路，是在英美的手中。

四 四國協定的難產

馬歇爾對於對德和約談判陷於僵局之時提出了解除德國軍備的四國協定草案。草案內容除約首外共五條；大致都很簡單，祇表明解除德國軍備的原則而已。其中主要之點為成立一監督機構，俾能調查德國全國的軍備及軍事工作，事實上這便是要打開蘇軍佔領區的大門。這計劃原來是去年夏季貝爾納斯在巴黎四外長會議中提出的，原提案定二十五年為期。當時莫洛托夫以草案中未規定對蘇賠款、取締納粹組織、及樹立民主基礎等為詞未表贊同，並稱二十五年為時也太短，應改為四十年等語。

現在馬歇爾舊事重提，且照莫洛托夫的意見改期為四十年。貝文和皮杜爾即表示接受，不過內容小節主張稍加增減。莫洛托夫在原則上也表示贊成，同時提出了一個擴大的修正案，除冗長的約首外共七條，將四國共

管魯爾區，德國中央政府有權沒收從前的德國工廠、托拉斯及銀行等的財產，四國證保肅清納粹份子，建設民主政治，訂立土地改革辦法，以及如何履行賠款義務等一併歸入，因此又回復到和約談判的一切難題，把馬歇爾提出的草案完全改變了用意。在這情形下，四國協定無法進行，馬歇爾責備莫洛托夫故意為難，而在莫洛托夫看來却是「構架」成功了。

五 和平的展望

在戰時盟國間對德共同作戰而成立同盟的，有一九四二年五月的英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捷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法蘇抗德同盟條約。這三個條約文字上有出入，但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且有效期間都是二十年。本年三月的英法防德同盟條約在形式上雖也屬於上述的系統，尤其與英蘇、法蘇兩條約相呼應成為英法蘇的三角防德同盟，而實際上因戰後國際情勢的轉變，政治上別有作用。明白了莫斯科會議失敗的原因，即知縱橫的防德同盟條約事實上已脫離問題的重心。最顯明的是蘇聯這次對於修改英蘇同盟條約的意見，堅決要加入彼此不能參加不利於對方的任何集團的條款，這明明是說同盟條約的對象已轉變了。因此今日的德國問題不復是德國本身是否將在二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中復興或重整軍備的問題，而是外來的衝突勢力是否能在一年或兩年之內，覓得諒解，完成真正的和平。

我們不必太悲觀，莫斯科會議的失敗，並不是決定對法國問題的絕望。馬歇爾報告中提到史太林曾對他暗示和平解決並非不可能。這含義是彼此尚須忍耐，尚須讓步。國際政治是多麼活動的東西，沒有一個公式定下來不能絲毫變動的。所以沒有理由不相信蘇聯對於各項問題將作相當的讓步，祇要莫洛托夫覺得國內國外機會適當的時候，他便會以反對英美一般的勇氣來和英美取得妥協。同樣在英美方面，祇要不犧牲他們的基本原則，一如馬歇爾和范登堡所說，也何嘗不可能接受對方的一點意見。重要的是彼此要保持着平心靜氣，深盼在艱難的時候，不復直接或間接的表示威脅的姿態。這樣和平的前途是有着希望的。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土太大」及其利弊

沙學浚

觀察二卷五期刊梁漱溟先生「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該文第四節講中國文化的「三大特徵」即廣土衆民，民族融合，和歷史悠久；提及中國抗戰能長期支持，由於「國土太大」，接着說中國「不易興」，「不統一」，也由於「局面太大」。國土大小對於國家命運是否具有這樣大的決定性，值得討論。

歐洲許多土地小的國家戰時容易亡是事實，但這一點不能反證中國抗戰不亡由於國土大。印度國土並不算小，何以千餘年來總是亡國呢？

海棠葉狀的中國原有一千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七七事變時，東北四省已亡，冀東已亡，外蒙已亡，新疆不在中央勢力之內，青康藏高原地廣人稀，對抗戰貢獻甚少，而且金沙江以西非中樞政令所能達。這樣，實際抗戰的中國只餘了四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的精華區域，都在短期間內被日本佔有，我們被迫退守到西部中國去。西部中國除四川有相當農產資源而工業還在「遷建」外，都是地瘠民窮的區域。梁先生卻認為「土地依然甚廣，人口依然甚多，資源依然甚富」，似與事實不符。

抗戰期中，西安一度吃緊，關中人民有逃往寶雞甚至天水的。日本會從湖南廣西勢如破竹的打到獨山時，不但貴陽危急，重慶也很震動，有再遷都的可能。由宜昌經萬縣打到重慶，軍事上並非不可能。這些說明了「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並非天險，中國長期支持，亦不能完全歸功于天險或國土大。日本能從東瀛三島經中國和南洋打到滇西的潞江，就一定沒有力量打進四川或西部中國嗎？日本在中國的失敗真由於「戰線扯得太長」嗎？

「國土太大」的中國在交通不便的過去，曾有兩次被文化低的胡人全

部征服，證明了有現代文化的日本，如果用全力對付政治不統一不上軌道而工業又不發達的中國，征服只有四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是很有成功可能的。

筆者認為現在及今後是世界時代，而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能支持抗戰，主要由於日本必須保留大部分的力量，去對付三個強大的敵國，只能以一部分力量對我，同時中國也就利用世界時代的國際關係，能夠得到外援以資長期的支持，最後「等」到了勝利。試看宋末明末的中國，入侵者雖然文化低人口少，却能全力對我，而我又沒外援可得，結果完全失敗。

筆者這樣講，並沒有低估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可歌可泣的戰鬥精神，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如果沒有這些，中國早就成為東方的維琪了，盟國也將遭受更多損失，才能獲得勝利。但是宋末明末也有這樣偉大的精神和意志，何以不能勝利呢？

梁先生說「中國不易亡在此（指國土太大），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譬如多年以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不統一。假如中國只有廣西一省這般大，不是早就統一了嗎？」中國不易統一，真由於國土太大嗎？

秦漢隋唐曾經統一了比抗戰初期的國土還大的中國，元代統一了全部中國而且能征服歐洲和南亞，清代統一了全中國，而版圖比現在的海棠葉狀還要大。筆者認為民國以來中國不統一，完全由於人不行；袁世凱果真為國為民，那時中國就可統一，國民革命軍底定長江後，如果黨政內部不分裂腐化，也很可能統一中國。

要統一中國，必須先統一「腹裏」，指中國舊「本部」與東北，這是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樞要區域，這裏若能統一而後才能談到控制地廣人稀的邊疆；在國力充沛時，進一步將失地收復。「歷史的中國」指舊「本部」，連遼東遼西在內，約四百多萬方公里，這是「民族融合」與「歷史悠久」的大國土，連近世移民成功的全部東北在內亦不過五百多萬方公里，古今就是這麼大，沒有多少改變。但中國歷史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的頻仍完全由于逐鹿者或朝廷力量的強弱。誰有力量，誰就能取他人而代之，建立自家統一的江山。朝廷有力量就能統一天下，並維持統一，沒有力量只好聽任分裂，等候亡國。以小比大，就可說父兄精明強幹，自能成家立業，子弟庸弱奢惰，必然家道中落。却不能籠統的說：「家產太多，家庭就不容易掌握了。」

請看看外國。日本在幕府時代，全國分崩離析，明治維新後，形成統一的政治局面，成為立國與建國的基礎與動力。

德國與奧國加在一起不過比四川省稍大，書同文，車同軌，文化語言完全相同，却分裂成為兩個國家，互相競爭對立，他們的合併（德文稱為Anschluss）被凡爾賽條約所禁止。在德國範圍之內，小邦林立，普法戰爭之前，普魯士與南德各邦總是對立的，彼此間的隔閡與界限，到第一次大戰時都沒有完全消除。南斯拉夫捷克和波蘭國土不算大，因民族複雜，統一總是很困難的。只有廣西省一半大的古代希臘，總是政治分裂，而同時代的大中國，却是統一的。國土小或很小，何常容易統一呢！

蘇聯革命建國之初，本部有政治對立與內戰，外部有國際干涉和進軍，而高加索、烏克蘭和遠東區則宣布自治，進行分裂運動，列寧一派革命黨人有力量一一克服之，才能建立了統一的蘇聯。在對德戰爭中，這個比中國國土大一倍有餘的蘇聯，全國統一，並無分裂或叛亂。二次大戰後，他還有足夠力量滲入隣邦，「統一」隣邦，現蘇聯本部及其所控制的十一個衛星國（包括韓國與外蒙），比縮小後的中國大一倍有半，不但不分裂，而且更強化。

美國國土連同遠隔重洋的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屬地，比海棠葉狀的中國略小，比縮小後的中國還要大，而其大陸與海島的國土，分散得非常遙遠，並未因「團體過大」而「感覺力遲鈍」，「活動力減低」（均梁

先生文中語），反而國勢蒸蒸日上，力量伸進了蘇聯以外全世界的每一角落。南美的巴西國有八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土地，是一個大國，也能統一。

美蘇巴西三個的例子證明國土真正大的國家，並不難統一。梁先生說「國大既是爲福，又足爲禍」，似應改爲「國大是福，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才能享福」——建設成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沒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只有折福——從腐敗混亂分崩離析到國破家亡。」

X X X

海棠葉狀的中國領土縱使金甌無缺，都不算大，因爲其中可利用地（包括已利用地）只佔五分之一，而地下資源既不豐富亦不全備。加之中國有四萬五千萬同胞擁擠在這片土地之內，每人平均分得的土地，尤其是可利用地，是很狹小的，因此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中外學者講到中國問題都認爲「人口過剩」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大問題。「人口過剩」就是國土太小的另一種講法。

誰都知道中國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必須實行工業化，尤其是農業的工業化，前者的結果是人口增加，後者的結果是農村的勞力更過剩，失業者更多。兩者共計要多出的勞動者將達數千萬之衆，可能等於歐洲的一個中等國家——法國——人口四千一百萬。工業不論怎樣發展，不能全部吸收這些過剩人口，國內又沒有很多的荒地供他們開墾。怎樣辦？歐洲工業革命後，人口因增加而過剩，大量移民到美洲尤其美國去，否則歐洲人民尤其工業國家的人民，生活是無法提高的。這個事實很值得我們猛省和焦慮的。

提高農民生活，經濟上最有效的辦法是讓每一農民獲得比現在多至少二三倍的土地，這麼的土地從那裏來？

總之，中國的國土絕對不大，在這個空權時代，一再縮小後的中國不論是否除去中樞政令一時不能到的國土，根本不佩稱爲大空間的國家了。

講現代國家的生活和國防必須把國力所能控制的海洋及其上的天空包括在國防空間之內。海洋占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即三萬六千一百萬方公里）最大部分被英美兩強所控制。倘促於東亞的中國和英美相比，可說是太渺小了，何大之有呢！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費孝通

——美國人性格之二——

Social Class 在中文中總是翻譯成「社會階級」。這個翻譯業以習慣，用的時候也不太細究了。其實，細細想來確是有問題的。「階」和「級」這兩個字都是指由低而高，斜面上分割的步驟。「拾級而登」，「進身之階」——都是指通門達戶的一條攀登的道路。我們若說「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工商階級」以及「長衫階級」等是不是說這些是像學校裏一串相聯的「年級」呢？在「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社會裏，工和商顯然並不相聯續在一個斜面上，直通「目標」道路上的「階」或是「級」了。除非我們說這兩個意義類同的字一加起來就失去各個字原來的意思則罷，否則「階級」一詞其實祇能指社會地位上升或蛻化的段落。如果我們願意這樣限制這個字的意義，凡是一個社會裏分化成的各個大體上不相踰越，而在價值上又分高下的團體，我們就不能說是社會階級了。這些有上下等分別的團體祇能說是社會層次。發生「爭鬥」的倒不常在「階級」之間，而是在「層次」之間。如果有人覺得這樣未免把用慣的字重加限制之後，用起來不方便，那麼我們也可以爽性用社會梯階來指可以攀登的段落，留「階級」一詞來包括梯階和層次兩者。

我咬文嚼字了一番，目的是要說明美國的社會很少「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分層情形，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分層性的社會和梯階性的社會很不相同。

印度是分層社會的極端型式。生爲婆羅門，衣食住行全得在這一層裏，死了也得葬得像個婆羅門。一生在一個層次裏生活，既然走不出這層次，人家也進不進來。這種端型式叫作 Caste。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分層分得沒有那樣細密和明劃，但是貴族和平民是層次之分，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登到貴族層裏去的，其間沒有梯子，而是一條鴻溝。

封建制度退化了歐洲，產生了一種中間人物，德國的 Mittelstand

，德國的 Petit Bourgeoisie，我們常在翻譯書中看到的「布爾喬亞」者便是。我說他們是中間人，因為這輩人是一個流動性，可上可下，不成一層次。上貴下賤是高低兩層，大夫之子恆爲大夫，工人之子恆爲工人——所以是兩層，是生了如是的。中間那些商人富農們，却很可能爬上或成爲新貴，也可以掉下去成爲難以翻身的無產工人。他們不是一層也不是一個集團而是在一個梯階的一批人。這梯階接通了兩頭。如果再進一步，這梯子上可以容許兩頭的人物也可升降，它把那分層的社會變成了梯階的社會了。社會梯階的發生不但改變了社會結構的性質，同時也發生了一種新的精神。這種精神可說是「攀登上進」的精神。在沒有登高到頂的人，有了一些可以上升的憑藉，他們必然要否定運命，否定社會地位是上帝安排下的崗位。在他們，好漢得靠自己，要白手起家，不希望祖宗餘蔭，不講究天生麗質；有本領的要從努力裏見顏色。他們不會安分的，他們要到處找塊腳石，有機會不肯放鬆，百變不離其宗的要達到「上去呀！」的目的。生活有計畫，講經濟，談話得考慮考慮，吞吞吐吐，看人顏色，一切行爲都是有作用的，是手段。是非感情的事，有害無益。緊張，疑慮，晚上多夢，白天也會見鬼，神經衰弱是他們的通病。

這種性格和一個生於斯，死於斯，身分地位改變不了的人不會一樣。在層次裏生活的，既然改變不了，祇有安之若素。譬如一個矮子，長不長，他不會成天照鏡子，比尺度。天也，命也，不痛快的也忍了。命運自有幸與不幸，但是安於其位是一樣的。他們無從緊張，不必努力。

美國這個社會，從這角度看去，是很別致的，大體說來是截去了兩頭層次，祇剩下了個中間梯階的結構。我說這是別致的，因為中間梯階是發生在兩端之間的，沒有兩端也就沒有中間了。美國的兩端不在美國，它是個移民的社區，是從歐洲中間梯階裏爬橫了，到了這新大陸，結果保持這

梯階的精神，永沒有頂的往上爬。

在英國，社會金字塔頂上的貴族們是有封號的，生來就是尊貴的。美國沒有這一套。他們沒有像英國一般一聽就知道這人出身的說話腔調，一看就知道這人地位的舉動禮貌。美國人並不在這些上邊表示分化。要在說話腔調，舉動禮貌上表示分化，每個人在他所處的地位上必須停留得相當久，而且一定得從小就生在這地位；像說話腔調那種富於習慣性的肌肉動作，長大了是不容易改的；即使改了，也很難自然，在別人聽來特別刺耳。美國人沒有人願意長久停留在任何地位上，於是這套附着於社會層次的各種文化特徵也就培植不起來了。

在英國一個出身高貴的人是掩藏不了他的社會地位的。我在印度旅館裏遠遠的聽見走廊裏有人問掌櫃的某人在不在，這個腔調一聽就知道這位先生是牛津大學念過書的，交談三句之後，他的來歷，他所認識的朋友和盤托出了。英國似乎是個很小的國家。在美國這種情形是不會發生的。在他們剛剛相反，祇要你借得着漂亮的汽車，時髦的行頭，任何人可以在最高貴的旅館裏出入。在說話，舉動，禮貌上不會露馬腳的。如果一個地位相當高的人，沒有留心他的裝璜，譬如說，他忘了在胸前掛上一個某某學會的金鑰匙，沒有在名片上刻上某某工廠的經理，他又穿得不太體面時，很可能被大旅館門前站着的那種穿着禮服的僕僮們冷眼看上幾眼。

美國人的社會地位是比出來的。如果大家有一輛當年最新式的汽車，汽車也就不成為表示社會地位的標幟了。這一點顯然又是和層次性質未脫的英國不同。在英國作為上等人標幟的特色是富有獨占性的。譬如說話腔調根本不容易半路出家，即使要學習也得天天和說這腔調的人接觸，換一句話說，得先加入了上等人的社會集團才有學習的機會。層次相當嚴格的社會裏，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美國的社會等級像個梯子，大家在上邊攀登，速度快，所以不能採用那些富於文化性的標幟，於是他們祇有在汽車，衣着，住宅浴室的數目等等物質條件上去爭強了。這些物質條件頓時成了每個想要面子，想要被人看得起的人所追求的對象了。一個原來不容易得到的物質條件，一旦因為經濟的開發，而大家可以得到時，這項條件也就成了必需品，失去了社會等級的標記。如果一時想不出新花樣，他們祇能在數目上比了。以汽車說，在戰前美國已到了每家平均都有一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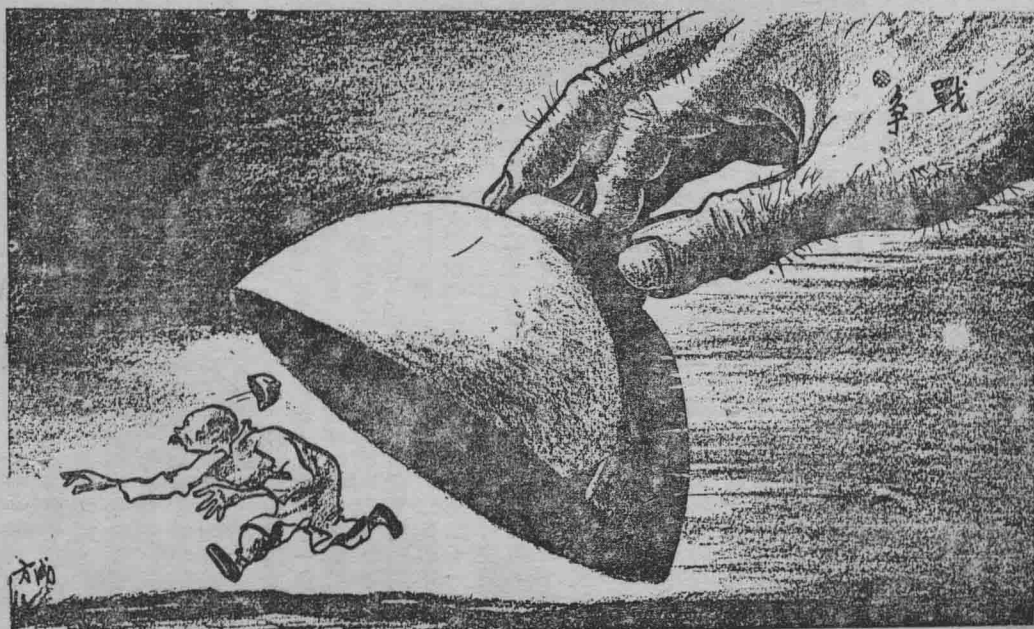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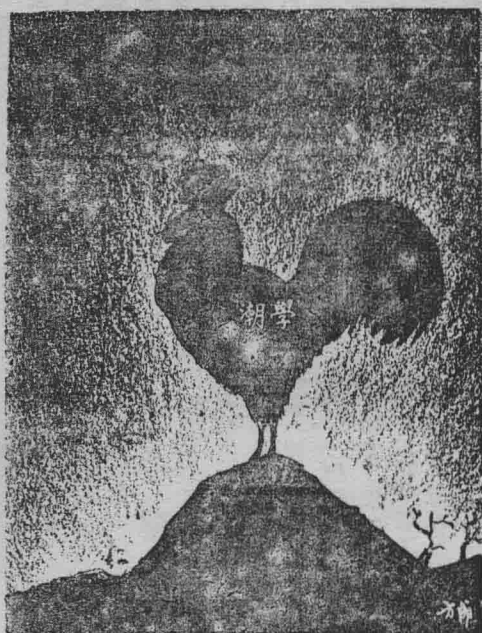
程度，於是祇能一面講時式，一面講數目。你有一輛，我有兩輛；你有一輛，我有三輛。新花樣難想，數量上比較倒不必費心思，於是美國社會地位多少成了量的比較，和英國社會地位偏重質的差別，大異其趣了。我們局外人看美國，他們似乎有一點數目狂。這種狂是狂得有社會背景的。而且由生活習慣變為物質條件，由質變為量，也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物質享受的增加確是世無其匹。美國人以浴室數目來表示住宅的高貴，多少是可以鼓勵他們清潔的習慣；英國太忽略了社會身分的物質基礎，到現在還是不太喜歡洗澡，也不能說是件足以驕傲的特徵。

美國社會地位既然要比較出來的，兩極端也就很少，而且沒有多大意義的了。爬到了最高層，除非到外國去，他就變了一個尺度上的記錄，本身固然是榮耀，但到了這地步也就空虛了。美國人崇拜造記錄。什麼都有個記錄，甚至繼續不斷跳舞的時間，喝啤酒的洪量，在高樓架空鐵絲上站立的長久，全有最高記錄。這些造記錄的人是值得崇拜的，因為他們給了美國人許多生活的目標，刺激生命的活力。在比較來規定社會地位的美國，不能沒有引誘人向前的記錄。美國社會是個梯子，不是平常的梯子，而是愈走愈長的梯子。有時在我們看來確是沒有什麼道理，但是這個活力却推動了他們物質的享受。這一點我們也不該忽視的。

印度是個層次的社會，也是個幾千年來物質享受最不進步的社會。英國在兩端的層次裏發生了個中間階層，現代的工業的發展就是這些中間人搗出來的。有人說民主、資本主義、科學、等等現代化的特徵，是中間人的貢獻，我也覺得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美國社會整個結構是個梯階。上下兩極端，一是紀錄，一是起碼，都不過是個記號，不成社會集團的。從這方面看過去，我們不該用「階級」一類的公式去猜測美國內部的政治現象了。他們是另有一工的，因為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在記錄和起碼之間流動着的人們並不團結成為共同層次利益而爭鬥的團體。他們不必去打倒在上的層次，因為每個人都有希望，或是相信有希望，有一天會攀登而入的。每一等級是通門達戶，接近記錄的石階。美國工人們缺乏一階級意識，到現在還沒有工黨，多少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記着的是福特、洛克斐勒都是工人出身，如果取消了這些記錄，他們努力的目標不是同時失去了麼？

美國是不是能永遠使工人中不斷的有福特、洛克斐勒這等人物出現？他們能不能使他們的社會梯階永遠開放，每個努力的人都能向上爬？這些是美國人所關心的問題，因為假如梯子一折斷，他們也是會變成層次性的社會的。

黎明的先聲



中大競選旁觀記

劉禹軒

「發揚一二五精神」

(南京通信) 誰

都知道「一二五運動」就是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重慶各校學生為促成政協成功舉行的遊行，而這次遊行是由中央大學領導並且作為骨幹的。這是中大和政治發生密切聯繫的起點，也是今天中大學生活動的一具馬達。要想了解中大這次競選的內幕以及今後的趨向，就不能不從「一二五運動」說起。

為了共商抗戰勝利後和平建國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於內戰聲中在全國人士的殷切期待下召開了。那時候，沙坪壩上敏感的大學生們幾乎每一秒鐘都是在屏息諦視着這一個會議的進展的。兩個星期的磋商不見一點兒端倪，國大問題竟成了國

運的一個暗礁，於是同學們再也按捺不住那份火急焦灼的心情了。血淚交流的迫切呼籲出現在「民主牆」上，前後祇經過一晝夜的醞釀，陪都數萬學生就在一個鮮明的旗幟之下怒吼起來了。他們高呼「政治協商會議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需要團結統一和平民主！」他們湧進國民政府（政協會議）振臂疾呼，其結果至於使「社會賢達」莫德惠痛哭失聲，而孫科也提出了「政協一定成功」的保證。雖然為了保持「絕對的中立」，他們的口號之中如「雙方釋放政治犯」、「雙方」以及「國大代表合理產生」的「合理」都頗為費解，但這一次遊行究不失為最公正，最純潔，最成功（成功指其本身，即其組織之完密，目標之齊一，行動之迅速。至於所發生的效果則因內戰

的熾烈早已無從提起的）的一次。正和政協決議是各黨派所共認的解決國是的綱領一樣（雖其對此綱領的解釋並不一致），「一二五」在中大也成了民主自由的象徵，到競選的時候無論是一屆的王世德徐振乾威其章，「發揚一二五精神」都成了他們的喊破喉嚨以廣招徠的金字訣。

英雄點將錄

「一二五」以前的中大學生自治會不是由普通選產生的。牠是一個個集各派派於一堂的「混合內閣」。那時侯內閣的常務理事是谷崇實。這位來路不明的黑眼鏡紅鼻頭的英雄對於「一二五」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他的精力一向是充沛飽滿的，但到主持系科代表大會決定一二五是否進行時就顯得

有點兒沒精打彩；到決議案需要執行時他又突然稱病閉門不出。他的臨陣脫逃正中現在競選的梅振乾的下懷，他就以當時副常務的身份挺身而出了主席團的一員（雖然並非選將），而這到今天也竟成了他的「政治鬥爭」的資本，他的用一竿梅花作標誌的競選標語上用斗大的字寫着：「梅振乾是一二五的領導者！」

谷崇實之後即首次普選產生的常務是郭亨衡。正和他的嫡傳王世德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競選的梅振乾一樣，他是「一二五傳統精神」的繼承者（這是梅對郭和王的稱譽，梅本人也以此自命）。「一二五」一週年紀念的盛況就可了然。當時郭的對手有兩個，顯然和他分屬於兩個壁壘，但因為力量分散，所以都歸於失敗。等郭任滿下台之後，兩個壁壘的對立更形森嚴。失敗的一方為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抬出一個徐為王和郭的嫡系王世德相角逐。現在和梅振乾對壘的威其章當時本就有意參加競選，但因受到上一次的失敗的教訓就讓徐單獨出馬了。王世德的勝利使中大左轉的路更向前延伸了一步。這條路之能否繼續向前延伸要看這次競選梅振乾之能否獲勝了，因為梅是以「繼承傳統精神」自命的。一二五風雲人物。

中大競選肇始於三十四年相溪分校。當時競選單位達七個之多，大家都以同學福利相矜誇，政治意識如果不能說完全沒有，至少可以說是非常淡薄。到郭亨衡就把他的「意識形態」露骨表出，競選單位也減少成三個。王和徐的鬥武更使冷眼人洞若觀火，左右兩個壁壘之間已沒有第三者的存在。至於這一次梅和威的宣傳更極盡黨派間捕風捉影互相中傷之能事。

兩個競選團體擁有其各自的外圍報紙。儘管甲報乙報都拍着身心說自己既客觀又忠實，然而有兩點是明顯，兩個競選團是尖銳地對立的。雖然都說無黨無派，却無法否認你左我的政治意識。第二，按照規定各可選團不得接受校外任何支助，向同學募捐每人也不得超過萬元，因之依據雙方公佈的帳目，每團所得不過數十萬元。以此區區何以能夠應付如此有聲（廣播電台）有色（標語漫畫）的大規模的宣傳？莫非今天的法幣到他們手裏就回復到戰前的價值？這真是天知地知他知你不知了！

在英雄們的家譜的考證上還有三件有趣的事實。第一，競選一開始徐為王就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向威系的「大公報」投書，「控訴」梅振乾，說梅以行將畢業離校之身不該參加競選，而後來事實證明徐本人上期競選時也是四年級，而且他於「讀者」之外還兼着「大公報」的「記者」！第二，谷崇實肥肉復生，靜極思動，這一次本來有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傳說，但忽然中途變卦，乘風高月黑之夜為威團大張標語。第三，王世德內閣全體理事會對梅團作有效的經濟援助，而且梅團也曾鄭重「鳴謝」，致被人目為「假公濟私」，「民主私相授受」。凡此三者都得到一部人以及另一部人的非難攻擊。夫非難攻擊多矣，而事出「有因查」有「實據」且有助於吾人對諸英雄來龍去脈之考證者，當無過於此三者矣。

矛盾中的統一

儘管壁壘是森嚴的，陣營是分明的，有幾點却可以作為一致的結論：第一，雙方都無黨無派，但誰也不能自拔於或左或右的政治意識。原因很簡